

C

AIZHENGJICHULILUNYANJIU

邹传教 著

财政基础理论研究



江西高校出版社

财政基础理论研究

邹传教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政基础理论研究/邹传教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12

ISBN 7-81075-538-2

I . 财… II . 邹… III . 财政学 - 理论研究.
IV . F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122052 号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 96 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92235,8504319

江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5.5 印张 140 千字

定价:12.80 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当代中国财政理论是伴随着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创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时期是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研究百家争鸣，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黄金时代”。这一繁荣局面，不仅表现在财政科学的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上，而且还表现为财政科学的应用研究得到了普遍重视。当代财政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和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古今中外的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可以成为研究的选题。目前，我国财政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多元结构体系，包括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财政历史研究、财政发展研究、财政比较研究和财政应用研究等多方面及其分支学科。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研究财政科学最基本的原理、概念和范畴，目的在于揭示财政现象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构造理论财政学的基本框架。

《财政基础理论研究》是作者多年来对财政基础理论有关问题所作的探索和研究，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1. 提出了马克思的整体分配观，认为“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占有产品”的原理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分配理论的核心内容；2. 提出了“国税”是一种特殊的财政分配（动态）过程，属于分配范畴的观点，认为国税与税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3. 提出了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的必然性，认为财政收入比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更快增长是一种客观规律；4. 提出了财政本身是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活动，认为财政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财政客观固有的功能；5. 提出了现实中财政收支永远是恒等的论点，认为“财政结余”和“财政赤字”只有在编制财政计划（预算）时才存在，现实中财政收支不相等

是不可能的;6. 提出了国家预算不是财政分配范畴而属于财政管理范畴的论点,认为国家预算不是财政分配体系的主导环节;7. 提出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具有民族性、自治性和地方性三大基本属性,认为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充分体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本质属性;8. 提出了通货膨胀虽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本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的论点,认为综合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理财思想、增收节支措施、改善财政分配机制、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多方面同步进行。

本书是作者《财政学研究》(上、下)一书的姊妹篇。该书收录了 20 世纪末 18 年作者对财政学有关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论文或文章 50 篇。与该书相比,本书是作者对财政基础理论若干问题所作的更为深入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两书是相辅相成的,两书结合起来更能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

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邹传教
2003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马克思财政学说与我国财政分配理论	(1)
一、财政学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产品分配理论的核心原理	
第二章 关于“国税”范畴及其与财政分配的关系	(24)
一、关于“国税”的概念和“国税”主体问题	
二、国税的基本特征及税收的基本特征	
三、国税、税收与财政分配的关系	
第三章 关于财政收入“超速”增长规律的理论依据	(42)
一、财政收入“超速”增长规律的理论分析	
二、财政收入增长与资金有机构成变化的关系	
第四章 关于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	(59)
一、国家财政本身是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财政宏观自发调控与财政宏观能动调控	
三、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财政调控的原理	
四、我国财政宏观调控不力的原因及政策环境分析	
第五章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收支平衡的观念问题	(75)
一、现实中财政年度收支永远是恒等的	
二、真正的财政结余是可以而且必须动用的	
三、国家举债的实质也是财政赤字	
第六章 关于“国家预算”范畴的属性与财政体系问题	(87)
一、国家预算属于财政管理范畴，不是分配范畴	
二、科学复合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理论分析	
第七章 关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问题	(103)

- 一、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基本属性
- 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 三、改革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的指导思想
- 四、改革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的具体设想

第八章 关于经济改革中的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 (115)

- 一、通货膨胀的根源、危害及消除通货膨胀的必要性
- 二、通货膨胀的财政原因及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

附 录 邹传教科研代表作简介 (168)

第一章 关于马克思财政学说 与我国财政分配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了整整40年的心血写成的一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科学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全面深入地研究了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成为历史的科学。因此，《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变革，并建立起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

一、财政学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财政学范畴的地位如何？这是当代财政经济理论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财政学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不同的人由于看待和观察问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同，最终结论是不相同的。这里仅就搜集到的资料作些简单介绍。

1. 外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财政学说的评价

我们先看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

等著作问世后,由于它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周密而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性,第一次向人们宣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最终必将为共产主义所代替。因此,它极大地启发了无产阶级的觉悟,成为指导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斗争指南,即具有极其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因而在受到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喜爱的同时,也遭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缄默抵制和扼杀。当然,这种企图最终并未能得逞。《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沉默的阴谋”,恩格斯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这部著作的光辉思想和伟大意义,并在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提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来学习《资本论》,此后《资本论》就广为流行起来,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被迫打破了沉默,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转为进攻。对于马克思的财政学说,情况也大致类似。大部分资产阶级财政学者大都采取缄默回避的态度和手法来反对马克思的财政学说。例如,德国财政学者瓦里贴耳·劳德茨在概述财政思想发展史的《财政学》中就没有提到马克思。其他德国财政学者如厄·艾别尔格、符·福凯、奥托·梅林格等,在他们的财政学著作中也把马克思略去了。法国财政学者列鲁阿·博立叶和美国财政学者艾·塞里格曼也采取了同样的回避手法。特别是艾·塞里格曼,他在《税收转嫁学说》这一著作中,除了对税收转嫁概念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外,同时对各种经济书籍中颇有影响的理论也作了研究,其中还用一定的篇幅研究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但却没有提到马克思,而仅仅提到弗·拉萨尔和德·哥·契尔曼。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财政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则声称马克思没有财政学说。伏·盖尔洛弗在《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写道:“一般说来,马克思在税收问题方面几乎并未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哥舍依德(在《国家社会

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著作中)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充足的财政理论基础’,这并非过甚其词。”盖尔洛弗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卡尔·马克思提到税收问题时,就像提到日常许多经济问题一样(例如海关关税、谷物法和交易所等等),是极其偶然的、顺便的。可以说,他已搁下它们不去研究了。”因为以他那充满着热情能窥透事物奥秘的目光看来,这仅仅是些“次要情节”,是“将真正敌人遮掩起来的一些帷幕罢了”(1849年1月9日谈到自由贸易问题时的一段话)他在1865年应《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约稿所写的“蒲鲁东批判”论文中指出:“不几年前,我想大概是根据洛桑市当局的建议,蒲鲁东曾以‘论税收’为题写了一篇公认为杰出的文章。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遗痕也淹灭了。除了‘纯粹小资产阶级的诉愿’而外,再无其他。”“我觉得,马克思在这些话语中不仅道出了他对蒲鲁东上述文章的见解,同时也说出了他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待税收的个人看法。对马克思来说,税收问题是手工业者与商人的问题,而不是工人阶级的问题。”盖尔洛弗的论断是这样的:即马克思之所以忽视财政问题,是由于这些问题只涉及到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未涉及到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盖尔洛弗:《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1922年德文版第11~16页)阿·伊·布科韦茨基也赞同盖尔洛弗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对财政问题并不感兴趣,也没有财政方面的理论。布科韦茨基的论证是:马克思把财政归属于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范畴,而马克思又只对经济基础感兴趣,所以对财政问题就不去研究了。布科韦茨基在他的著作《财政学导论》中所写的原话是:“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财政经济没有特殊兴趣。他们对这个问题就如同对上层建筑那样不愿去详细研究,因为上层建筑的命运是由它赖以成长起来的那个经济基础的命运来决定的。”(布科韦茨基:《财政学导论》1929年版第174页)某些资产阶级财政学者则声称:马克思对财政问题没有作出系统的论述。伯拉·弗尔德斯在《财政学》中写道:“在有关社会

主义的书籍中，我们尚未见到财政学方面的系统论述。”他只在注释中提到：“关于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象的税收和债务问题可参考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拉萨尔的《间接税收》。”（弗尔德斯：《财政学》1927年版第30页正文及注释）福尔·麦哲尔在其专著《十九世纪迄今的德国财政科学史》中也没有把马克思列入德国经济学者和财政学者之内，而只是在说到斯坦因学说原理时提到一次马克思的名字。

现在我们来看看前苏联财政学者的观点。原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符·昌特拉捷在《财政理论问题》中写道：“马克思的财政学说是其经济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范畴是经济范畴的发展形式。因此，它在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总体系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在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中已经包含着对各个经济范畴的合乎逻辑联系的阐述，并把财政范畴先规定在第三部分里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三部分写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9页）马克思在其研究计划的第三部分对财政范畴的安排，说明了他的方法论的特点，即每个范畴在各范畴的阐述过程中均占有一定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把各种有碍的次要因素排除了，单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研究。在这里，他没有去研究那些对资本主义本身整个发展过程起次要作用的异己因素。”“但资本就其内容而言却是多种多样的，它不仅限于直接生产过程，它自身还受到上述各种情况，首先是流通过程的次要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从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对资本进行了研究，尽管由资本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借以表现在社会表层上的各种具体形式，这时还不够清晰。因而马克思为了阐明资本运动的真实情况，便又在《资本论》第3卷仔细地研究了那些逐渐趋于具体形式的各种现象，这就是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利润、

利率、地租等等。它们是同一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但却转入了各种不同人的手中，而成为各自独立的形式。在此之后，这些表象虽然已临近社会表层，但仍未最终浮出社会表层之上。国家就属于这种异己现象次生作用之列。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保护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外部条件。’国家能对社会关系起作用，并使分配过程发生变化等等。在这里，由于国家作用于分配关系而引起的各种变化，特别是预算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所引起的变化，使得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更加繁杂。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关系也由于预算制度的影响发生了种种变化。”“税收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的再剥削形式。对工资课税和把税收转嫁在工资上会引起剩余价值各转化形式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在马克思的经济体系中已给税收划出了一定的地位。所以，马克思不能在《资本论》第1卷中去研究它。他写道：‘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5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税收给工人状况造成了危害性的影响，但在这里，第1卷中他对税收只谈了这么多，即税收制度加强了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在利润、利率、地租之后，给财政范畴也规定了应有的地位。这是因为财政范畴是较之地租、借贷资本、商业资本等范畴更为具体的缘故，所以才把它排在地租的下面。”“马克思仅仅是从形式上把研究方法同阐述方法分开了。而研究工作则是从分析具体事物着手的，首先要求掌握住材料，并弄清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阐述方法…次序倒是由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这种关系看来是同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昌特拉捷：《财政理论问题》1987年

中文版第 12 ~ 14 及 17 页)

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财政学者的看法。日本立正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坂入长太郎在《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将“马克思主义财政论”列为全书五篇之一，并专门列出了“马克思的财政思想。”他写道：“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当中，并未论述国家财政论。其中只是部分地触及公债或者赋税而已。根据这一点，有人指责马克思不关心财政论，…不足…论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计划希望通过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并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阐明非生产阶级、赋税、公债和公共信用，把财政学看成是经济学计划的一环，是财政学对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形态的总结。但是马克思终于未能完成作为经济学一环的财政论的理论体系。关于这一点，日本大内兵卫博士指出：“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续编中进行了‘汇集在国家形态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在这里他仿佛试图论述有关‘非生产的’阶级、赋税、公债和公共信用等问题，但是就连坚韧不拔的马克思也不得不为之‘却步’。因此到了今天，也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财政论和赋税论。但是至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问题的本身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密切联系，有关这方面的根本思想，已经从不同角度一鳞半爪地表露出来。”（四方田敏郎：《马克思及其他》日文版第 1 页）由此某些财政学家就认为马克思及恩格斯对于财政问题在理论上未予关心，这种批评不见得公正，马克思有关财政问题的基本论点，在许多论文及时事述评中谈及，例如他指出赋税问题是与分配有关的，而赋税改革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发生影响等等。（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1987 年中文版第 318 ~ 319 页）

2. 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财政学说的看法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国财政学者的看法。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子基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一书的编写说明中

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为我们创立财政学，但在他们的大量论著中却蕴含着十分丰富、宝贵的财政思想。”他在《〈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的表述是：“马克思虽然在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财政学著作，但是他在《资本论》以及其他有关论著中，有许多关于财政理论的论述。马克思的这些财政理论，是《资本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宝库中的杰出成就之一。它不但为批判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和揭露资产阶级国家财政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为社会主义财政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关于马克思的财政思想及财政学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邓子基教授的论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财政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第1页）“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吸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研究和考虑创建财政学的。”（同上书，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典学派财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在吸取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明确论述了财政诸范畴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形态；第二，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关于从经济导出国家的观点出发，阐明财政与国家的关系，确认财政学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的地位；第三，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科学成分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具有“财政学”的含义，并且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明确地把拟建的财政学包括在内。（参见邓子基、杨炳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第17、20、24页）马克思的财政学说受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是很明显的。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是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开端，它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财政学，它是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的。亚当·斯密对资产阶级财政学的贡献最大，影响也最深

远。恩格斯曾评介说：“产业革命时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发表了自己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75 页）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一著作中，他批判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继承了前辈理论上的成就，进一步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他在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利用整篇篇幅专门讨论了国家财政问题，包括国家经费（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公共收入源泉（各种赋税和公债）以及著名的“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税费”四大征税原则等，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财政理论。也就是说，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是溶于经济理论之中的。所以，1857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拟定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体系也是把财政学包含在内的。马克思指出：“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最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6 页）这里，第三部分指的就是马克思拟定要研究的财政学。到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二次拟定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时仍是把财政问题包括在内的。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

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国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可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体系中,马克思是给了财政学范畴应有位置的。马克思的财政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把财政问题作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或者说,为什么马克思在世时没有完成财政学的写作计划?对于这个问题,邓子基教授在《〈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写道:“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完成财政学的写作计划,主要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内部结构。”他说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以后,在写作第二分册草稿的过程中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因而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得到了重大发展。而经济理论发展了,经济理论的结构也必然要随之调整。到1862年,当《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快完成时,马克思就提出了关于自己经济学著作结构的新设想。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已经脱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编,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后不久,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正文中又穿插拟定了三个有关经济学著作结构的设想。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写成标志着《资本论》结构已经形成。但是,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为了把精力集中到资本这个“精髓”问题上去,因而,没有完成财政学的写作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著作中就已经舍弃了他的财政理论。相反,在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无论是正面的理论论述,还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都包含着马克思关于财政问题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邓子基、杨炳昆著:《〈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第27~28页)在《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题研究》中,邓子基教授的分析又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再生过程揭露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秘密时,把财政问题舍弃掉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没有把财政问题列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是贯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思路的,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财政是剩余价值再分配问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它较之利润、工资、地租、利息更为具体。因而在《资本论》研究范围,它被舍弃掉了。但马克思已经拟定了要研究财政问题的计划,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分篇设想时,指出,‘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资本论》主要解决了前两个问题,虽然也涉及到后面一些问题,但都不是作为一个问题加以系统研究的,因为要留作以后再来研究。可惜的是,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以后就逝世了,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也未能相应加以继续研究。其二,由于资本主义财政对社会再生产来说是外在的。舍弃了财政问题,并不影响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本质透视,并不影响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剥削秘密。其三,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仍以自由竞争为主,财政对社会再生产的干预作用还比较微弱。后两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派生的。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财政